



研究概況

## 經世文編與 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研究

黃克武

### 一、前 言

近年來經世思想的研究逐漸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一九八三年八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劉廣京先生和陸寶千先生的主持下召開「近世中國經世界想研討會」，首開其風；一九八六年一月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ACLS)舉辦「宋代經世思想與行動研討會」；同年三月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亦在黃俊傑先生的主持下召開「中國思想史上的經世傳統研討會」。經世思想的研究蔚為風氣。

經世思想的範圍十分廣泛，表達的方式亦多彩多姿<sup>①</sup>，很難給予清楚的界定。在近史所及清大所召開的研討會中，學者們曾熱烈地討論經世思想的「定義」問題。有人認為只要關懷外在世界秩序的思想就是經世思想，所以經世思想不限於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佛家都有經世思想，甚至無政府主義、錢穆的「國史大綱」、R. H. Tawney 對中國農業的看法皆屬經世，這種看法被批評為「泛經世」；也有人認為只有自稱經世，或被同時代學者視為經世的思想家才有經世思想，這種看法又被認為範圍太狹窄。從上述的討論中我們發現依靠現有的研究成果，仍無法對經世下一定義，目前對經世思想的研究應拋開定義問題，先深入探討不同時代經世思想家對「經世」的具體看法，在研究過多數的個案後，或許可以歸納出一個較恰當的定義。

在各類有關經世思想的著作中「經世文編」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對象，它

<sup>①</sup> 見劉子健，「經世—關於英譯名詞和史科分類的討論」（未刊稿，清大「中國思想史上的經世傳統研討會」參考資料），劉氏認為經世之學的目標可以大別為道德、制度、專項事功三類；其根據也有經書、心性哲理、歷史三類，兩者交織可分成九項不同的史料，由此可見經世之學的複雜性。

是明朝末年至民國初年間知識份子表達經世界想的一個重要方式。由於明顯地標出「經世」之名，故屬於經世界想絕無疑問，詳細研究經世文編將有助於了解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經世文編」的共同特色是藉著文章的纂集而表達編者的經世意念，在近三百年中（明末至民初）經世文編的編纂前後相承，形成一個延綿不斷的經世傳統，這批數量龐大的史料（據估計總字數超過三千萬字）仍是一片有待開闢的處女地。本文的目的是對晚明以來各種的經世文編以及初步的研究成果作一介紹，並反省研究方法，展望未來的發展。

## 二、經世文編簡介

近代經世文編的編輯一般多溯源到「皇明經世文編」<sup>②</sup>，此書編於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編者主要是隸屬「幾社」的陳子龍（臥子，一六〇八～一六四七）、徐孚遠（闇公，一五九九～一六六五）、宋徵璧（尚木，生卒待考）三人，全書網羅明洪武至天啟年間臣僚著作三千餘篇，正文五百零四卷，補遺四卷，共五百零八卷。編排方式是以人物為中心，多數是一人一卷，少部分為一人數卷或數人一卷。收錄的文章包括奏摺、文集集中的作品、往來書信等。清初因政治因素，將此書列入「應銷毀書目檔」，故道光以前該書流傳並不廣泛<sup>③</sup>。最近日本學者出版了一本明代經世文分類目錄，包含了「皇明經世文編」等十一部明代的經世文編，使資料的運用更為方便<sup>④</sup>。

清朝第一部較著名的經世文編是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出版的「切問齋文鈔」，編者為山東地方官陸燿（朗夫，一七二六～一七八五），全書蒐集清初以來各類文章四百餘篇，計三十卷。該書的編輯方式與皇明經世文

② 其實在皇明經世文編出版之前已有經世文編性質的書籍，如萬表（一四九八～一五五六）早在嘉靖二十三年（一五五四）即編有皇明經濟文錄，四二卷；此外江右的馮應京（一五五五～一六〇六）在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亦編有皇明經世實用編，二八卷，內容包括皇明祖訓、六部事務、禮樂射御書數、諸儒語錄等。見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 Fa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141, 1339.

③ 李光潯，「正在影印中之皇明經世文編」，載大陸雜誌，二五卷九期（民國五十一年），頁一〇。

④ 該目錄由東洋文庫明代史研究委員會編纂，一九八六年三月出版。收錄的書籍如下：(1)陳子龍等編，皇明經世文編，五〇八卷。(2)萬表編，皇明經濟文錄，四一卷。(3)汪少泉編，皇明奏疏類鈔，六一卷。(4)張瀚編，皇明疏議輯略，三七卷。(5)孫旬編，皇明疏鈔，七〇卷。(6)王嘉寶等編，皇明兩朝疏鈔，一二卷。(7)黃訓編，皇明名臣經濟錄，五三卷。(8)陳九德編，皇明名臣經濟錄，一八卷。(9)黃仁溥編，皇明經世要略，五卷。(10)陳子莊編，昭代經濟言，一四卷。(11)吳亮編，萬歷疏鈔，五〇卷。

編不同，不採人物為中心，而以類別為分類標準，將性質相同的文章集合在一特定項目之下。全書分為學術、風俗、教家、服官、選舉、財賦、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時憲、河防等十二項。這種以類別為中心的分類方式，以及將「學術」置於卷首統領全書的方法為道咸以下各經世文編所仿效。文鈔出版之後陸續再版，道光初年河南布政使楊國禎曾重刊此書；同治八年（一八六九）江陵錢氏再度重印，並將書名改為「皇朝經世文鈔」，目前中研院史語所、臺大、近史所分別收藏了一種版本。文鈔出版於考據學風大盛之時，足證乾嘉時期士人的經世傳統仍未斷絕。

文鈔出版後的半個世紀，又出現了第二部重要的經世文編，此即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應賀長齡（一七八五～一八四八）之邀而編輯的「皇朝經世文編」，該書於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出版，書中收錄清初至道光三年間的文章二千二百多篇，共一百二十卷。全書分為八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學術」，為全書之綱領；其次是「治體」，說明政治的基本原則；再其次則依六部的順序分為「吏政」、「戶政」、「禮政」、「兵政」、「刑政」、「工政」，討論具體的行政技術。各部分之下編者再細分為六十五個小目。由此可見文編不但條理清晰，且籠罩面更為完備。就思想內涵而言，文編出版於鴉片戰爭前十四年，足可反映西力衝擊前夕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狀況，同時也說明儒家求變的精神絕不能單純地解釋為對西方挑戰的反應，而是中國思想史自身的一種發展<sup>⑤</sup>。

文編出版後廣受學者的歡迎，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曾國藩（一八一～一八七二）、左宗棠（一八一～一八八五）、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康有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等人早年都曾批讀此書<sup>⑥</sup>。俞樾（一八二一～一九〇七）尤其給予好評：

自賀耦耕先生用前明陳臥子之例，輯皇朝經世文編，數十年來風行海內，凡講求經濟者，無不奉此書為渠菴，幾於家有此書<sup>⑦</sup>。

由於文編廣受士人歡迎，出版之後的六、七十年間，以「補編」、「續編」

⑤ 見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經世致用條，載史學評論，第五期（民國七十二年），頁四五。

⑥ 曾國藩在日記中表示「經濟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見求闕齋日記，卷上，頁八。左宗棠早年曾仔細閱讀皇朝經世文編，所藏該書「丹黃殆遍」，見左文襄公年譜，卷一，頁七。張之洞認為文編最為切用故將之列入書目答問，建議士子閱覽。康有為閱讀文編的紀錄見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五年項下。

⑦ 俞樾，「皇朝經世文續集序」，收入春在堂雜文，四編，卷七，頁二〇上～下。

爲名的書籍接踵而出，前後有二十多種。這些出版物不僅在名稱上沿用經世文編之名、體例上多數與「皇朝經世文編」類似，甚至有些書的卷數亦保持一百二十卷。學術界曾有多篇文章介紹這批史料，爲了說明上的方便，我們綜合各文，將「皇朝經世文編」之後的各經世文編列成下表<sup>⑧</sup>：

	名 稱	編 者	刊行年代	卷 數	附 記	資料來源
1	皇朝經世文編	魏 源 賀 長 齡	道光六年 1826	120		①③ ②④
2	皇朝經世文編補	張 鵬 飛	道光廿九年 1849	58	原 120 卷中 62卷有目無文	①③ ②④
3	皇朝經世文續編	饒 玉 成	光緒七年 1881	104	原卷 120 卷中 16卷有目無文	①③ ②④
4	皇朝經世文續編	管窺居士	光緒十四年 1888	120		②
5	皇朝經世文續編	葛 士 潛	光緒十四年 1888	120		①③ ②④
6	皇朝經世文續編	盛 康	光緒廿三年 1897	120	盛宣懷與繆荃 孫協助	①③ ②④
	皇朝經世文三編	陳 忠 倚	光緒廿三年 1897	80		①③ ②④
8	時務經世分類文編	求 是 齋 主 人	光緒廿三年 1897	32		③ ④
9	皇朝經世文新增時 務洋務續編	甘 韓	光緒二三年 1897	時務40卷 洋務 8 卷	亦名皇朝經世 文三編增附時 事洋務	①③ ②④
10	皇朝經世文新編	麥 仲 華	光緒廿四年 1898	21		①③ ②④
11	皇朝經世文新編	麥 仲 華	光緒廿八年 1902	21	爲上書之改訂本 ，刪除一百多篇	① ②④
12	皇朝經濟文編	求自強齋 主 人	光緒廿七年 1901	128		③ ④

⑧ 表中所列僅限於沿用「經世文編」爲書名者，除此之外還有「時務叢鈔」、「邊事叢錄」、「洋務叢鈔」、「策論彙海」、「治平十議」等書亦由經世文編衍生而成，爲免龐雜，擬日後再予介紹。參考王爾敏，「經世思想之義界問題」，載近史所集刊，第一三期（民國七十三年），頁三四。

13	皇朝經濟文新編	宜今室	光緒廿七年 1901	62		①
14	皇朝經世文統編	潤甫 (邵之棠)	光緒廿七年 1901	107		①② ③④
15	皇朝經世文統編 (增輯經世文統編)	闕名	光緒廿七年 1901	120		③ ②④
16	皇朝經世文四編	何良棟	廿緒廿八年 1902	52		①③ ②④
17	皇朝經世文五編	求是齋	光緒廿八年 1902	32		① ②④
18	皇朝經世文五編	闕籍	光緒廿八年 1902	26		④
19	皇朝經世文續新編	儲桂山	光緒廿八年 1902	20		④
20	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	甘韓 楊鳳藻	光緒廿八年 1902	21		①③ ②④
21	皇朝蓄艾文編	于寶軒	光緒廿九年 1903	80		①③ ④
22	民國經世文編	上海經世 文社	民國二年 1913	40 (冊)		①③ ④

資料來源：

- ①日本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經世文編總目錄，東京，一九五六。
- ②平凡社，アジア歴史事典，東京，一九六〇，卷三，頁二八三～二八四，百瀨弘撰「皇朝經世文編」條。
- ③錢實甫，「關於經世文編」，載歷史教學，一九六八年八月，頁一三～一八。
- ④黃麗滿，魏源年譜，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頁二六六～二六八。

當代學術界中首先注意到這批史料的是日人百瀨弘，他在一九四一年撰成「清末の經世文編に就いて」，對於「切問齋文鈔」以後的十部經世文編的編者、成書背景、收錄文章作簡明的介紹。他強調時代的變遷會促使文編內容與編纂型式的變化，故文中詳細地討論各書綱目的增減及其代表的意義。他認為陸燿的「切問齋文鈔」是以朱子學思想為基礎，故注意各種典禮，強調政治與道德的結合；至魏源所纂「皇朝經世文編」加強了實際傾向，故刪除了天文、樂律部分，而增加水利、河防方面的文章。鴉片戰後中國局勢發生變化，光緒年間葛士濬、盛康的續編為適應新情況，增加「洋務」部

分，介紹新知；至陳忠倚的三編，更明言「皇朝經世文編」中儒行、宗法、禮論、婚禮、喪禮、服制、祭禮等項對富強之術毫無裨益，故多予刪除，而另增測算、格致、化學、礦務等。麥仲華的新編在經世文編發展之上是一大突破，作者認為該書不但在體例上打破了以「六部」為中心的編輯格式，內涵上亦有所創新，書中宣傳康、梁的維新變法，收錄外人著作，介紹泰西史地。總結清代的經世文編，百瀨弘認為這些書籍先則主張繼承傳統逐步修改，後則力倡維新變法追求富強，反映出清末中國讀書人政治思想的變遷<sup>⑨</sup>。

日本學者對經世文編一直有濃厚的興趣，一九五六年日本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在市古宙三的提議下，蒐集了十七種經世文編，編成經世文編總目錄，並附作者索引及各書綱目變化的對照表，該書的編成使這批史料更為人所知，對於經世文編的研究有很大的貢獻。

一九六八年大陸亦有學者撰文介紹經世文編，即錢實甫「關於經世文編」一文，文中介紹了十六部經世文編的編者、綱目與內容大要，錢氏亦談到各書收錄文章的差異可以反映編者的不同立場。例如邵之棠輯「皇朝經世文統編」，「主要蒐集清季以來有關新政言論，混合中外著述編排」；闕名所輯「皇朝經世文統編」，「主要是封建文士和洋務官僚以及帝國主義侵略份子的言論，維新色彩較少」；于寶軒所輯的「皇朝蓄艾文編」則「選輯馮桂芬以後各家有關變法的著述」；至於「民國經世文編」則明顯地偏向袁世凱：

很像「公牘彙編」的性質，主要的侵略份子如古德諾和有賀長雄等也被選入，但全書無孫中山一文，對袁世凱則稱「大總統」而不名。關於張振武被害和宋教仁被刺，以及鎮壓「二次革命」的材料，全部列入內政門的「定亂」目中，其態度可知。

錢文對於經世文編內容的介紹十分豐富，但分析不及百瀨弘之細膩。

美國方面也有學者注意到這批材料，不過僅限於「皇朝經世文編」。據說費正清曾建議張灝以「皇朝經世文編」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在介紹文字方面，一九六九年Frederic Wakeman在「清史問題」上撰寫“The Huang ch'ao ching shih wen pien”，次年Peter Mitchell又在同刊物發表“A Further note on the HCCSWP”，兩文均為簡短的介紹性質<sup>⑩</sup>。此後似乎並無學者從事經世文編思想內涵的分析，至一九七八年劍橋中國史晚清篇出

<sup>⑨</sup> 百瀨弘，「清末の經世文編に就いて」，收入加藤繁編，池內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座右實刊行會，一九四一，頁八七七～八九二。

<sup>⑩</sup> 見 *Ching-shih wen-t'i*, 2.10 (Feb. 1969), pp. 8-22; 2.3 (July 1970), pp. 40-46.

版時，Susan Mann Jones 和 Philip A. Kuhn 在討論到道光初年經世思想時，仍然認為「皇朝經世文編」值得作進一步的研究<sup>①</sup>。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從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學者就已經注意到經世文編的資料，但半個世紀以來對經世文編的研究卻僅限於內容的介紹，至多觀察綱目的變遷。雖然也有不少文章引用經世文編中的史料，不過多數是從事制度史的研究，並沒有學者以「經世文編」作為一個整體，深入分析其思想內涵。關鍵的問題是經世文編一方面有編者主觀的選輯排比，另一方面又包括數百位以上作者不同的意見，它如何能成爲一個思想的「整體」？又應該採用何種方法來分析？或許是由於這樣的困難，以經世文編研究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的工作一直沒有推展。這種情況從去年開始逐漸改觀，下面我們先介紹初步的研究成果，接著再反省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問題。

### 三、經世文編思想內涵之分析

從一九八五年六月至一九八六年六月間先後有四篇論文分析經世文編的思想內涵，分別是：

(一)皇明經世文編部分：許淑玲，「幾社及其經世思想」，一九八六年六月，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二)切問齋文鈔部分：黃克武，「從理學到經世——清初切問齋文鈔學術部分之分析」，一九八六年三月發表於清大「中國思想史上的經世傳統研討會」。

(三)皇朝經世文編部分：有二篇

1. 黃克武，「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分析」，一九八五年六月，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 劉廣京、周啟榮，「皇朝經世文編關於『經世之學』的理論」，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表專題演講；全文刊於一九八六年六月，近史所集刊第十五期。

下面介紹各文的主要論點：

(一)許淑玲「幾社及其經世思想」

<sup>①</sup> Susan Mann Jones and Philip A. Kuhn, "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in John K. Fairbank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 Part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49-150.

該文由李國祁教授和墨子刻 (Thomas A. Metzger) 教授指導，全書主旨在分析幾社的組織活動與經世思想，其中經世思想部分主要即以「皇明經世文編」作為分析對象。作者從「歷史觀」、「經世目標」、「濟世方策」三項討論該書的思想內涵。

在歷史觀方面，幾社同意三代是理想的時代，而三代以後則有盛有衰。例如秦晉隋是衰世，漢唐宋元則有不錯的表現；較特殊的是幾社認為明朝初年是一個理想的黃金時代，足可媲美周、漢，但明中葉以後逐漸步入衰微。對於歷史人物他們特別推崇張居正。

在經世目標方面，幾社主張追求王道，但他們認為王道不離富強，因為王霸之辨在於「心」不在「迹」，所以只要出於愛民之念，不必諱言追求富強。富強的目標具體而言包括武功強盛、社會均富、風俗淳美。此外，他們反對實施高遠而不切實際的井田制度與封建制度，主張在現行的郡縣制度之下實現上述的理想，同時對明初的盛世感到不勝嚮往。

在濟世方策方面，幾社特別強調制度應隨時勢而不斷調整，要「以昭代（當代）之人文，經昭代之國事」，故全書收錄各種有關制度改革的意見。作者以影響深遠的「一條鞭法」為例，說明幾社對制度改革的想法，她認為幾社傾向於支持一條鞭法的各種改革，從大量的選文與編者的眉批，足以顯示他們的立場，作者並分析這種肯定一條鞭法的主張或許是由於幾社所居的江南地區適合實行這種新制度所致。但是「皇明經世文編」亦收錄少數（如葛守禮和何瑋等）反對一條鞭法的意見，這種情形顯示幾社也了解地理位置的差別會影響制度實施的效果，所以他們亦提出「一條鞭有利有弊」的觀點。上述對一條鞭法的複雜意見充分反映幾社經世思想中的調適精神。

為了突顯幾社經世思想的特色，作者將之與東林黨人和明末清初的經世思想家作一比較。她認為東林經世思想有濃厚的道德色彩，幾社基本上肯定道德的意義，但重心卻在制度的因革損益，與東林不同。此外，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黃宗羲（一六一〇～一六九五）有強烈的復古傾向，要求恢復封建；幾社卻主張法後王、行郡縣，反對泥古。幾社這種重視變通的精神反而與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的思想頗為契合。

從以上的描述可知作者雖然沒有全面地分析「皇明經世文編」的思想內涵，因此遺漏了許多幾社對制度改革的精彩意見，但大致已勾勒出該書的特色。

(二) 黃克武「從理學到經世——清初切問齋文鈔學術部分之分析」

本文希望藉著分析切問齋文鈔學術部分的五十一篇文章解決兩個問題：



第一，乾隆末年出現的「切問齋文鈔」是在何種學術基礎之上提出其經世的主張？第二，該書與道光初年的「皇朝經世文編」有何關係？

對於第一個問題作者認為文鈔經世思想主要淵源於清初的程朱理學，而與顧、黃、王等大儒者的經世思想沒有直接的關係。它繼承了理學長期以來由抽象轉向具體的趨勢，進一步地不再討論太極、理氣、心性等抽象問題，而將焦點置於日用事物；此外它放棄了清初理學中強烈的宗派色彩，改採尊崇程朱但不排擠陸王的調和主張。在思想內涵上文鈔學術部分各篇文章環繞著「體用兼備」、「有體有用」、「明體達用」的理想，細釋其「體」的含意主要指道德與知識的涵養而較少宇宙論的意味，而「用」則確指外在的事功。這種體用合一的理想一方面矯正了理學末流流於空疏無用的弊病，另一方面亦使士人在關懷外在事物時不致落入法家或功利思想的「邪說」。文鈔各文反覆地提出這種觀念使理學思想「外轉」，開出一條通往經世的道路。

「切問齋文鈔」正是處於這種思想轉向的關鍵地位。

但是清初理學不是切問齋文鈔的唯一淵源，書中還包含了其它的思想因素。例如編者強調官僚制度內部的技術改革，他亦提出「文以載道」的觀念，認為士人撰寫有意義的文章或將這些文章集結出版是經世的一個重要方式；此外在編者的觀念中學術具有準備、嘗試與諮詢討論的精神，不一定要立即實現內聖外王的理想等等。這些觀念都與理學的看法不同，而共同塑造該書經世思想的另一種特色。

對於第二個問題作者首先指出，魏源所編「皇朝經世文編」在編輯型式與文章選裁方面都受到「切問齋文鈔」的影響，兩書前後承接的關係十分明顯。但文編除了繼承主要源於清初理學的經世思想外，還受到許多其它思想的影響，其中明末清初經世思想家顧炎武、唐甄（一六三〇～一七〇四）等人的影響力尤其顯著。因此作者認為道光初年經世思想的興起背後有二股重要的推動力量，一為主要源於清初程朱理學的經世思想，一為明末清初顧炎武、唐甄等人的經世思想，而與今文學派並無直接而密切的關係。

（二）黃克武「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分析」與劉廣京、周啟榮「皇朝經世文編關於『經世之學』的理論」

「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是全書的理論部分，與後面討論行政技術的「六政」部分各篇文章性質不同，構成獨立分析的對象。這兩篇文章是在互不影響下選擇了相同的史料從事分析，因此予以合併介紹。拙著碩士論文是由李國祁教授與墨子刻教授指導，劉廣京先生的大作則是與他的學生周啟榮先生合作完成。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拙文是以一套分析架構為基礎，打散各篇文章的界限，用歸納的方法描述文編學術、治體部分的思想內涵；接著再以「轉化—調適」的分析架構，配合比較方法觀察其思想的特點。劉文則依循文編的編排順序，逐篇介紹學術六卷與治體八卷中各文的內容；其次再綜合分析其學術取向與政治立場。比較兩文的大綱可以看出作者處理方式的差異：

拙文	劉文
一、導論 二、背景 三、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內涵 1.知識的來源 2.現實世界的基本組成與活動 3.目標 4.對歷史的看法 5.濟世之策 6.經世思想家對目標、障礙和濟世之策的綜合評估 四、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特點 1.轉化思想與調適思想 2.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特點 五、結論	一、導論 二、學術六卷內容大要 三、治體八卷內容大要 四、綜合分析 (一)學術 1.立志與經世 2.經史致用 3.對考證學之態度 4.對道學之態度 (二)治道 1.君道 2.臣道 3.行政功效 (三)天人觀 1.以氣為本之宇宙觀 2.福禍報應 (四)重勢通變之歷史觀 (五)王霸之辨與變法 五、結論

這兩種不同的思想史研究法很難比較其優劣，或許只能說是風格上的差異。

在結論上，兩者的主張如下：

拙文認為文編經世思想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源於先秦儒家思想與宋明理

學。從各文對諸葛亮的推崇顯示，只要是出於愛民之念，儒家也可以改革制度、追求實效，甚至可以嚴刑峻罰，藉著諸葛亮的例子經世思想家說明儒家注意外在事功的合法性。但是文編除了承襲儒家傳統外還受到其它因素的影響，如儒家思想的法家化、官僚制度的經驗、民間宗教中「福善禍淫」的觀念等。再者文編特別強調儒家傳統中「兼內外」的理想，因此調和了理學與功利學派，對於內在道德的涵養，與外在事功的表現賦與同等的重視。此外它亦調和了漢學與宋學，主張以宋學為本、漢學為末的調和論。若與明末清初的經世思想比較，文編避免了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復古和反清復明的主張，亦與「皇明經世文編」過度尊重當代政治權威，要求返回明初祖制的思想型態有所不同。作者認為文編的經世理論結合了重視理想主張澈底改造的轉化思想，與重視現實主張逐步改良的調適思想兩種型態，因此它一方面以高遠的王道為理想，堅持道尊於勢；另一方面則反對復古（恢復井田、封建），肯定現存的政治秩序。這種思想趨向理想與現實並重，而要求在現實世界中實現其理想。

劉廣京先生的大作指出文編首十四卷具有體制嚴謹，立場鮮明的特點，同時以「經世之學」為一門學問，足與漢學、宋學分庭抗禮，並非如「皇明經世文編」僅為施政文牘之彙編而已。

其次作者認為文編「經世之學」的涵義十分複雜。舉凡為學為政之原則，以及學者之志向、為學方法、個人道德修養，以及對人性、天道、歷史之了解等，凡與政事及致用之原則有關者，皆屬其範圍，故文編經世之學可視為大學八條目之具體發揮。但就文編史料而言經世之學雖牽涉甚廣，仍有三個原則決定其範圍：

1. 須以能「致用」為目的。
2. 以政府施政為立場，特別重視君主與朝廷，但亦不輕視各省及州縣地方行政。一切經世活動均以合法之政府為權威之泉源。
3. 專取以民為本之經世觀，此點顯示文編仍基於儒家愛民的立場，而非法家尊君的立場。

最後作者點出文編在中國近世思想史上的意義。他們認為文編「經世之學」在鴉片戰後擴大而為救時之學問，成為近代講求經濟、變法各種學術政治運動之先驅。就十九、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而言，文編揭櫫之「經世之學」乃一「基線」，道光初年以後思想學說之發展，皆須憑此基線衡量比較。

由以上的敘述可以發現兩文的結論不完全一致，但可以互相補足加深讀者對「皇朝經世文編」經世理論的了解。

以上我們簡單地介紹過去一年中對於三部經世文編的研究，各文顯示這三部經世文編並非漫無中心的文牘彙編，而是表現出一套特殊的價值取向，不同時代的編者面對了不同的挑戰，選擇不同的文章，因此也反映出不同的思想特色。

#### 四、研究方法的反省

最後我們嘗試依據以上的四篇論文提出研究經世文編時值得思考的一些問題。

(一)經世文編要成爲一個思想的整體，必須假設該書的編者在編輯過程中表現出高度的選擇性。因此研究經世文編首先必須掌握住「編者的選擇性」。例如在該書序例中，編者是否談到編書的動機與標準？這些標準與選文是否配合？又如編者在書中是否有眉批或圈識？此外編者的選擇性可能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對不同作者而言，編者爲何選擇某個人的文章而不選另一個人文章？文章選入數目較多的作者有那幾位？他們是否具有某些相同的背景？
2. 對同一位作者而言，爲什麼書中選擇這一篇文章而不選另一篇文章？亦即某一位作者本來的形象與他在經世文編中被塑造出來的形象有無不同？
3. 就同一篇文章而言，在作者文集上的標題和內容與它在文編中的標題和內容有無出入？亦即編者有無更改標題或刪除內容？如果有，他的動機何在？

對於「編者的選擇性」而言，目前初步的看法是：經世文編的編者對於學術、政治的基本原則往往抱持著一套較鮮明的立場；然而對於技術層次的問題（如治河、禮儀、開礦等）常常並不提出一個固定的答案，而是提供二個以上的選擇，但是這些選擇仍然包含在一個特定範圍之內，並非漫無邊際。研究經世文編必須針對其史料性質，了解對那些問題編者持有確定的立場，對那些問題則提出一系列「意見的光譜」(spectrum of the opinions)？

(二)爲了較清楚地掌握經世文編的思想傾向，可以運用兩組觀念來對照。第一、該書經世思想的目標較接近徹底改變的轉化思想，還是逐步改良的調適思想<sup>②</sup>？第二、書中所採取的經世手段是強調政治核心的改革，還是偏重政

<sup>②</sup> 轉化與調適的對照請參考墨子刻老師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h'ing Bureaucracy: Legal, Normative, and Communication Aspe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第一章，以及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第四章。

治核心之外的各種行動？上述兩組觀念交織成四種思想型態，即強調政治核心的轉化思想、強調政治核心的調適思想、政治核心之外的轉化思想，以及政治核心之外的調適思想，研究者可據以從事思想型態的分類，並比較其異同。

(三)研究經世文編時值得注意的另一個問題是各書對歷史的看法。例如他們認為歷史上有那些黃金時代，是三代？三代以後？還是本朝？對黃金時代的看法往往影響到目標的設定與方法的抉擇。此外書中認為歷史上有那些值得效法的英雄人物或應該警戒的前車之鑑？例如許淑玲的文章談到「皇明經世文編」對張居正的推崇，拙著碩士論文談到「皇朝經世文編」各文推崇諸葛亮、貶抑王安石，劉廣京先生的大作認為「皇朝經世文編」之理想乃仿效管仲之政法。這些對歷史人物的評價都反映出各書經世思想的特色。

(四)研究經世文編不但要考慮編者所肯定的觀念，也要掌握他所拒絕或否定的觀念，因為他所拒絕的部分影響到他所肯定部分的意義。例如拙文分析「皇朝經世文編」學術立場時談到文編一致反對的學術或思想計有老莊佛道、「王安石」類型的儒家思想、考證訓詁、詞章之學、市井小民的逐利態度，不完全反對的學術思想有法家和功利學派，只有小部分人反對但大多數人都支持的學術思想為宋明理學。這樣的研究可以從另一面烘托其基本立場。

(五)具體而言研究經世文編主要是利用歸納法與比較法，前者適合分析思想內涵，後者則可突顯其思想特點。用歸納法研究思想內涵可細分為以下幾個步驟：

1. 仔細閱讀經世文編中的史料。
2. 歸納出各文所討論的重要議題 (agenda)。
3. 對於每一個議題編者採取一個固定的立場？還是收錄了一系列「意見的光譜」？
4. 各議題之間是否有內在的關連或邏輯上的順序？如何能做一較清楚的敘述？

了解思想內涵後可以進一步運用比較法觀察其特點，比較的對象可選擇同時代或異時代的思想主體。例如許淑玲的文章將「皇明經世文編」與東林經世思想、顧黃王等人的經世思想作一比較；拙文討論切問齋文鈔時將之與「性理精義」、「皇朝經世文編」作一比較；劉廣京先生則將「皇朝經世文編」與「皇明經世文編」、宋代理學和功利學派等作一比較。

以上各項是綜合四篇研究成果，從研究方法的角度所作的反省，然而誠

如余英時先生所謂「史無定法」<sup>⑬</sup>，上述各項僅為從事研究時值得考慮的一些問題。

### 五、研究展望

過去一年中，由於墨子刻教授和劉廣京教授的提倡，逐漸有人開始利用經世文編從事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的研究。但無疑地目前仍處於起步的階段，還有十幾種經世文編，仍乏人問津，在這批為數高達三千多萬字的史料中，包含了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對學術、政治、社會、經濟、軍事、科技等方面的複雜看法，這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環。以上述的研究為基礎，還可以從事許多的研究工作，例如：

(一)目前對文編的研究多偏向學術、政治基本立場之分析，沒有從事有關六部行政技術的探討，而這一部分的資料是各經世文編中數量最龐大的部分。因此我們還不了解各書對行政技術的看法，也不了解學術、政治基本立場與行政技術之間的關連。這項研究工作同時涉及制度史與思想史兩個層面，極具挑戰性。

(二)在分析工作進行的同時也不可忽略綜合的工作，亦即如何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來重建明清經世思想的「地圖」？例如我們可以列出明清時代各種型態的經世思想：(1)東林黨人的經世思想。(2)幾社編輯的「皇明經世文編」。(3)顧炎武、黃宗義的經世思想。(4)王夫之的經世思想。(5)唐甄的經世思想。(6)陸燿燾編輯的「切問齋文鈔」。(7)魏源、賀長齡編輯的「皇朝經世文編」等。我們還可能列出其它的經世思想，然而值得考慮的是他們之間有何異同？我們又應如何透過已有的研究成果掌握明清經世思想的發展？這樣的工作可以擴大視野，將研究的對象放在歷史脈絡中來思考。

(三)誠如劉廣京先生所謂：皇朝經世文編為一「基線」，可據以衡量鴉片戰後中國思想的發展。因此我們可以問鴉片戰爭以後一連串的經世文編各有何特色？它們與鴉片戰前的經世思想又有何異同？研究這些問題將有助於我們了解現代化時期中國思想的延續與變遷。

以上的研究工作不是個人所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多數人的合作與長期的努力，盼望有興趣的學者能共襄盛舉。

(本文的重要觀念受到墨子刻老師啟示，特此誌謝。)

<sup>⑬</sup> 見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代『發刊辭』」，載史學評論，第一期（民國六十八年），頁一四。